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王愿坚

WANG YUAN JIAN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王愿坚代表作

范胜田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王愿坚代表作

范胜田 编 责任编辑 曲 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新乡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插页 字数 257000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964

ISBN7-215-01535-1/I·118

定价 8.25 元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炎璧

前 言

“风格就是人。”（布封语）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与作家的“人格”密不可分，要触摸一个作家的创作轨迹，了解作家生活的足迹，无疑是重要的。

王愿坚曾向笔者说：“我的生活道路与我的创作道路是一致的，我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是同步增长的。”这话一点不错。王愿坚足下走的是一条健康坚实的路，他的笔下，写的是一群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

王愿坚是建国后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有独特风格的短篇小说家。水有源，树有根。要探索王愿坚的艺术风格，不能不追溯他的家庭影响，孩提时期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教养。

1929年3月1日，王愿坚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相州镇一个地主之家。他的伯父和父亲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当中学国文教员，因资助王荃美同志的革命活动，无暇照顾生产而导致破产，成为破落地主。二王两家，关系密切，往来频繁，王荃美同志牺牲后，他的遗孤就是在王愿坚家长大成人的。年幼的王愿坚既受到政治上的熏陶，又受到文学的感染。王愿坚家是个文化家庭，家里藏书很多，上小学三年级时，就囫圇吞枣式地读起了《聊斋志异》、《今古奇观》、古典诗词等。到十岁时，就似懂非懂地啃起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了。作者回忆说，那

时读书不少，但只能记住一个故事梗概。茶前饭后，王愿坚还把这些故事讲给小伙伴听。后来，王愿坚的小说故事性强，大概就是对古典小说这一民族传统的继承吧。

“七七”事变，家乡沦陷，辍学在家，王愿坚上了“家庭学堂”，听伯父、父亲讲解陶潜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也讲一些有进步倾向的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鲁迅的《一件小事》等。这就使王愿坚较早地接触了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受到了文学的熏陶和感染，对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外名著的民主思想精华，给王愿坚以精神食粮；日本侵华的累累罪行，增强了他的民族意识。日寇在相州安上据点后，恢复了小学，王愿坚上了五年级。他门门功课都好，惟独对进行奴化教育的工具——日语，十分厌恶，常常因为背不出日语单词，而挨打受罚。这就是王愿坚踏上革命征程的心理依据。

幼年的文学熏陶，家庭环境的影响，还不是王愿坚走什么道路的决定条件，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教导，文学前辈的指引和生活的积聚。

抗日战争时期，王愿坚的家成了我党敌后工作的一个联络点。他从联络员那里，读了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革命书籍，也从联络员那里听了不少威武雄壮的革命故事。春雨润物细无声，革命的种子开始在这颗幼小的心灵里萌动。于是，他开始担任一些诸如站岗放哨的工作。1944年7月，刚刚15岁的王愿坚就被我敌工部的同志“贴邮票寄去”山东军区，参加了革命。因年龄小，到滨海干部学校学文化去了。个把月后，日寇对滨海区实行万人大扫荡，王愿坚又隐蔽在一位老乡家里，做了大娘的干儿子。这是王愿坚经受扫荡

之苦，战争锻炼的第一课。后来他的成名之作《党费》中最感人的细节，就是从这个时期生活感受中“化”出来的。

1945年1月，王愿坚参加了八路军。194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他当过文工团团员、宣传员，跟随部队，转战南北，有时深入农村扩军筹粮，有时与敌人短兵相接，经受了战场的考验，感受了革命气息。战争中的见闻，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净化了王愿坚的心灵，促使他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54年，《党费》发表，轰动文坛。但王愿坚的一举成名，绝非偶然。其中，有思想上的准备，也有生活的积累，小说，只不过是生活感受和文学素养“结婚”后的“产儿”（王愿坚语）。正像周总理所说：“好作品的产生，可以是偶然得之，但是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长期的生活和修养基础上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谈话》第2页）王愿坚熟悉党史，了解红军的发展史，了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对红军的长征史，也做过系统的调查。1950年，他还参加了22军军史的编写工作，对这支从小小游击队发展到一个英雄的部队，他掌握了大量的素材；他参加过《星火燎原》的编写工作，也帮助过一些老同志写过回忆性的文章。在《解放军文艺》工作期间，曾采访过东山岛战役，后又由厦门步行至广州。这中间，采访过身经百战的老将，也采访过出生入死的老交通；既有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也有天真活泼的儿童……这次访问，不仅使王愿坚领略了闽西、闽南的社会风貌，而且也听了大量的闻所未闻的红军时代的革命故事。通过史的了解，他深深感到“史中有诗”，我们的民族、国家、党和军队，值得大写特写，大颂特颂。他认为，这些优秀的人物，纯洁高尚的灵魂，不反映出来，塑造出来，传达给人民，

保存下来这笔精神财富，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辜负了党对一个宣传员的重托。

好的愿望，不就是动人的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是思想与艺术的融合。王愿坚有生活的积累，有情感的触发，也有艺术上的借鉴，写作技巧上的“练兵”。他在文化部门工作期间，阅读了《活人塘》、《平原烈火》等文学作品，也学习了茅盾的《创作的准备》以及其它文艺理论，又直接接触了宋之的、魏巍、陆柱国等军内外作家，学到了不少创作的经验，也集中研究了当时国内的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短篇小说。但是，岸上是学不会游泳的，一切要亲自实践。王愿坚以文艺理论为指南，根据在战争中的体会，也根据部队宣传工作的需要，写过多幕歌剧《回头》、话剧《模范指挥员》、《突上古龙亭的勇士》和《一捆麦穗》；1950年至1951年间，还写了些生活追记和纪念战友的文章。在《解放军文艺》当记者、编辑期间，写了报告文学《东山岛》和《珍贵的纪念品》、《水的故事》、《打！听你指挥》等四个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非上乘之作，但它是“入门”之前的艺术技巧上的准备。这样，历史的风貌，个人的真实感受，文化的素养，创作经验的积累，到1954年，王愿坚创作的岩浆就喷发出来，继《党费》发表后，相继推出了《粮食的故事》、《三张纸条》、《赶队》等。到1956年，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党费》问世了。同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担任了第四届和第五届作家协会理事。

小说集的出版和职务的提高，并未使王愿坚昏昏然，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思想和艺术上的不足。所以，王愿坚把以《党费》为代表的这个时期的作品称为“习作”，称为“入门时期”的作品。（见王愿坚1986年给笔

者的信）既是“入门”之作，难免幼稚、粗糙，比如《粮食的故事》，就没有抓住戳人心尖的情节进行典型描绘，有把“黄金屑”掺进了“沙堆”之感，显得拖沓、冗长。收入《珍贵的纪念品》集子中的《珍贵的纪念品》、《水的故事》等，只注重了真人真事的复述，缺乏典型化，有报告文学的色彩。清醒的反思，是攀登高峰的新起点。王愿坚下决心，向选材严、开掘深、集中凝炼的目标进发，努力表现人民军队的人物美，事件美，语言美，行为美，性情美，心灵美。他追求的这种美，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种武器和力量。有志者事竟成。1958年，作为王愿坚来说，是个“丰收年”，写作并发表了报告文学《时刻准备着》和小说7篇。此中的《七根火柴》、《三人行》等，终于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王愿坚的小说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高度。这几篇小说，人物、情节高度集中、凝炼和典型化，是一组言简意深、果小味甘的珍品，实现了作者以少胜多，以小见大，在尽可能短的篇幅中，蕴含尽可能多的内容的愿望，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和赞扬。此时，王愿坚的文学触角，也伸向了现实生活，写出了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新作《普通劳动者》、《亲人》、《理财》等作品，沟通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作品既有现实的高度，又有历史的深度，人物性格具有立体化的厚度。这几篇小说，情节生动，人物典型，思想深刻，认识意义重大，作到了倾向性、真实性和生动性的统一，达到了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体现了王愿坚小说创作的新水平，形成了朴实、明朗、单纯、简洁、凝炼的艺术风格。这些作品，是王愿坚小说创作由“入门”到成熟的标志，是王愿坚小说成熟期的代表作。有眼光的文艺评论家说，王愿坚是一个大有希望很有发展前途的短篇小说家。

不幸的是，正当王愿坚的小说创作进入高产期之际，一场浩劫从天而降，剥夺了他的创作权，赶进了“牛棚”，白白浪费了他十余年的大好时光。粉碎“四人帮”后，他才又重操旧业，拿起“画笔”。政治上的解放，极大的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写出了《足迹》、《路标》、《草》等10篇小说，再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长征途中的生活和光辉形象，其中《足迹》获1978年由《人民文学》主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夜》、《肩膀》获儿童文学荣誉奖。这些，就是作家所说的“恢复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仍然保留着“文革”前小说中的激情和风貌，更为可喜的是，在这些小说里，为塑造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形象，蹒了路子，摸索了经验，是十分宝贵的。

“文革”后的十年，是王愿坚探索的十年。他不但试图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塑造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取得了成功，而且还拓宽了创作体裁，既“触了电”，也写起了散文，且均有成绩。1974年，他和陆柱国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塑造了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红色少年的形象，1981年获中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奖二等奖。1976年，与肖穆合作创作并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映山红》。1982年，与黎明等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四渡赤水》。1986年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作者以红军长征为题材写了电影剧本《草地》，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艰苦生活和感人形象。1979年加入中国电影家协会，任第四 五届电影家协会理事。1982年加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任理事。1984年任中国少年儿童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现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工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王愿坚步入文坛三十余年，积极探索，

辛勤耕耘，既撰写过报告文学、散文，也改编、创作过电影文学剧本，还写过不少文艺理论性的文章，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使他名震文坛，享誉社会的，是他那一篇篇革命的思想内容和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短小精悍、深刻动人、朴实明朗的短篇小说。就眼下而论，王愿坚的艺术风格，就是王愿坚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至今，王愿坚共发表短篇小说33篇，从艺术性的角度可分为“三期”（入门、成熟、恢复），时间跨度是三十年。但从作品的政治思想倾向而言，并无“期”可分，主题是统一的，多是歌颂共产主义理想，歌颂强烈的革命精神，塑造光彩夺目的英雄形象。这是王愿坚小说的共同主题和艺术追求的目标。他的小说，从最早的《珍贵的纪念品》，到恢复期的长征路上的《路标》、《草》、《歌》三个短篇，大多取材于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中的战斗生活，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那是一个战火纷飞、血泪交迸的年代。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红军被迫长征，沿途战斗频繁，饥寒交迫，艰苦异常；在原来的革命根据地里，敌人“围剿不已，屠杀不止”，扬言“石要过刀，人要换种”。这是当时的生活环境，也是王愿坚小说的主要题材。要说王愿坚的小说别具一格，选材就是重要的一面。这样的题材无疑是重大的，政治色彩是鲜明的，给读者的感染力也是很强的。王愿坚小说中的人物，有工农红军的男女指战员（《支队政委》），也有东北的抗日游击队员（《歌声》）；有长征中的英雄战士（《七根火柴》），也有“一心为红”的老苏区坚持地下斗争中的人民（《党费》）；有成熟而睿智的革命老干部（《普通劳动者》），也有用党的乳汁哺育着的红色少年（《小游击队员》）；有亲手缔造和创建我党我军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路标》),也有英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少共”(《赶队》)……总之,王愿坚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系列的、数量可观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形象,是一座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既富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又性格迥异的英雄形象的画廊。在王愿坚已经发表的三十几篇小说里,找不到一篇不是以对于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热情歌颂为主要内容的。正像作者在《普通劳动者》一书的后记中所说“歌颂英雄的前辈,努力开掘、搜求和理解革命的精神遗产,这就是我学习写作过程中,给自己定的艺术探求的目标,也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一句话,王愿坚的小说,题材是重大的,政治内容是强烈的,倾向是鲜明的,调子是高昂的,起着和正在起着教育人民,感染人民,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巨大作用。人们殷切期望能够通过真正的艺术形象来回顾我们的前辈所走过的艰辛道路,看到我们的父兄在四十多年前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惊天动地的壮举,这个愿望在他的小说中,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

王愿坚的小说,政治色彩浓,但并不单调、贫乏;其中写了众多的共产党人形象,但却丝毫无“千人一面”的雷同之感,其奥秘就在于他挖出了蕴藏于人物心底深层的美——革命的人性美和人情味。作者在《大胆表现革命的人性美》一文中说:“写人,就要写活生生的人,就要写人和人的关系,就要写人的特定的悲欢离合的命运和喜怒哀乐的感情。只有把真实具体的人性和人情写出来,才能创造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才能把阶级性体现出来,形象才具有艺术感染力。”因为“人性美和人情味,从来就是文艺作品感染力的要素和联系创作和欣赏的纽带。”(王愿坚《人·人性·人情》)王愿坚小说中,充满革命的人情味和人性美的作品,是不胜枚举的。且不说拨乱反正彻底纠正了“左”

的思潮后写的那10篇小说，就是在“左”的倾向较强的文化大革命前写的不少作品中，人情味浓的也俯拾皆是。短篇小说《亲人》曾被“四人帮”指斥为充满资产阶级人性味和人情味的“毒草”，这无疑是一盆泼向这株“香花”的一瓢污水！《亲人》中的曾司令员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认牺牲了的战友的父亲为“亲爹”，让那位盼儿盼瞎了眼睛的老人得到心灵上的安慰，是充满人情味的，但这是革命的人情和人性，是纯洁的、高尚的。正是这种人情、人性，使“老人那张像揉皱了的纸似的脸孔登时舒展开了”，盼儿盼碎了的心一下“愈合”了，也使得作者笔下的将军成为一个品德高尚、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和教育作用，实现了古人千百年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好的理想。“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集外集拾遗·答客诮》）《党费》中的黄新，《粮食的故事》中的郝吉标，《妈妈》中的冯祺等，他们既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又是血肉之躯。他们丰富的人情和人性，有真挚的爱，也有强烈的恨；有欢乐，也有悲伤。作为妻子，黄新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更入静时，她轻轻地哼着《送郎当红军》的歌曲，思念长征路上的亲人；作为母亲，她爱自己的女儿，在生离死别的时刻，她抱起孩子亲了又亲，尔后，面对敌人的屠刀，毅然走向刑场；郝吉标这个在苦难中磨出来的硬汉子，当在保粮和保儿的矛盾时刻，最后决定牺牲亲儿保存红军的粮食后，“不由得浑身都颤颤起来”，“眼泪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妈妈》中的人情味，更是浓厚。如果说《亲人》中的曾将军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榜样”，那末，《妈妈》中的冯司长就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母爱的典型。《妈妈》写的是主人公冯祺从事地下斗争的故事，而作者把她对敌斗争的壮举，悄悄地通过儿女之情的氛围

去体现。在她接到党的紧急指示需立刻去上海执行任务时，偏偏负责给她路费的同志突然被捕，并给她留下一个呱呱待哺的小女孩。这就把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摆在她面前：去，手无分文；不去，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她决定保护战友的遗孤，卖掉六岁的亲生子，换取路费前往执行任务。亲生孩子从自己的怀里拉走了，永远不能再见了！此时作者用一组回肠荡气抒情味很浓的排比句，把生离死别的悲情、母爱之情，推向了高峰。作者写她十步一回头，边走边流泪的场面，情真意切，催人泪下，骨肉离别时所激起的感情的浪花，汇入了汹涌澎湃的革命的波涛，相当真实地表现了主人公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的真实感情。这种感情是动人的，人情味是浓重的，然而它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它表现了人物的那种革命工作高于母子之爱的性格特征，展现了主人公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这种美在革命理想的照耀下，达到了党性和人性的统一，有了崭新的内容，从而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也使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较好地结合起来，产生了攫取人心的艺术魅力。

王愿坚的小说不仅思想性强，而且人物形象十分生动感人，有血有肉。

王愿坚的小说写得都较短。纵观他的小说，最长的，不过万把字；短的，还不上两千字。在这些短短的篇幅里，虽说还没有塑造出像阿Q、三仙姑、李双双、赵满囤、乔光朴等那样活生生的令人过目难忘的艺术典型，但是，他展示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一群有声有色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是不可多得的。尤为可贵的是，他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探索了塑造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形象这一极为严肃、重要的课题，并获得成功，积累了宝贵经验。

描写人物追求“神”似，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特色。王愿坚刻画人物，就注意不求“形”似，但求“神”似。鲁迅曾说：“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部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王愿坚的小说在刻画人物上走的是一条既省俭文字，又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道路。他把那些画“头发”绘“肖像”省俭出来的文字，挤出来的篇幅，完全倾注于人物“神”的描绘上，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虽然篇幅短，然而却蕴含深，外形不酷似，性格特征却异常鲜明、突出，真可谓“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七根火柴》写的是有限的七根火柴的保存和移交。作者在平凡的事件中，发掘出了它含义的伟大，看到一个红军战士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他把数量上微不足道，体积上极为细小的七根火柴，放在长征这个典型环境里，它的价值，就不能用一个“七”字作估了。作者就是通过对火柴的精心保存，小心递交，来刻画无名战士的“神”，讴歌这位不把火种交给革命死不瞑目的无私者的形象，反映出了蕴蓄于红军战士身上的革命的火花，做到了思想与形象，哲理与诗情的统一。《三人行》，在不足四千字的短文里，写了有名有姓的王吉文、小周和黄元庆三个人。对这三个人，作者既未交代他们的出身，也未写他们的外貌，谁胖谁瘦、孰黑孰白，完全是一块空白，实在谈不上“形”。然而，作者就是通过这三个伤病员，一背二，二拉一的艰苦跋涉的描绘，通过人们想像不到的种种困难的叙写，在读者的心头，高高地树起了浮雕式的塑像，也使读者深深体会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友间的阶级情谊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征服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力量，是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法宝之一。《肩膀》中有一个由几十个字编织的一个“补叙”，故事虽短，但它可以窥见王愿坚画“神”的功力。小说从小秦的眼中看

到，“就在这位同志在陷进烂泥潭之前的一霎，他还拼着全力，把担子抛到了泥潭边边上。这样，担子保住了，小秦就靠这担子拦了一下，才没有掉进泥潭。”这位身陷泥潭壮烈牺牲了的同志，既无姓，也无名，在外貌上未着一字。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拼着全力”，抛出的是长征路上急需的药箱，抛出的是告诫后来人免蹈泥潭的标志。他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把生的希望捧给了同志。他死了，但一座无名丰碑却久留人世。《赶队》是王愿坚以长征为题材的头一篇。在长达数千字的小说中，主要写了“我”和护士小何两个人，而重点又是写的小何。重点写小何，但写她外形的文字却寥寥无几。通观全篇，她的“形”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小鬼，小小的一张圆脸，尖下巴，长长的眼睫毛下面有着一对大眼睛，短短的头发表上，歪歪地扣着一顶洗白了的八角帽。”描绘这个一篇之主的人物的“形”的文字就只这些，省俭得不能再省俭了。作者把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全用在刻画小何与“我”，小何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上。在冲突中，写她的“神”，突出她“少共”的性格特色，展现她的灵魂美。作者通过她一系列动作性很强的“表演”，如：为战胜睡虫，用两根草棍儿撑眼皮；为躲避敌人的搜追，背“我”跳悬崖；为让伤员吃上粮，自己偷偷吃野草，……一个天真活泼，聪明干练，舍生忘死，乐观坚毅的“少共”形象，赫然在读者心头立起。粉碎“四人帮”后，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作者用传神之笔，用以小见大之笔法，塑造了“几位伟大的人物的……长征生活的一点侧影”，获得了成功，得到了好评。《路标》中的毛主席，《启示》中的周恩来副主席，《标准》中的朱总司令，《同志……》中的贺龙，既不是写他们运筹帷幄，也不是写他们斩将夺旗，而都是通过一件极细小的事，一个